

監控的鏡頭與反抗的鏡頭： 《全面監視》的觀後感

李仰桓

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

在觀看《全面監視》(Total Trust) 之時，會一直吃驚：到底導演是如何記錄到這些畫面的？根據我後來在網路上查詢到的資料，導演張嘉玲在 2019 年推出《獨生之國》後即被中國政府盯上，就此無法回國。因此，她是以遠端遙控的方式，指揮在中國境內的工作人員透過各種偽裝，才順利拍攝到三位維權人士及他們家人的遭遇。

《全面監視》大致記錄兩個主題，一是中國維權人士及其家屬的遭遇，二是中國運用高科技布建的監控機制；而在這當中，「監控」是貫穿全片的關鍵詞。我們可以看到，挾著優勢的人力與資源，再搭配尖端科技，中國政府如何把監控玩的淋漓盡致，完美打造歐威爾式 (Orwellian) 的社會。

透過媒體報導，我們或多或少知道中國政府利用科技工具進行監控：透過裝設於全國的數億個監視鏡頭，以及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，海量的蒐集各式資訊，再運用當前正夯的人工智慧（這無疑是中國的強項）解析這些資訊，讓所有人無所遁形。

但我們比較不知道的（至少就我個人而言），是搭配著科技建構起來的監控體系及人力運用。例如影片一開始就觸及的「網格化管理」，將全國劃分成無數的「網格」，每個網格設置不同層級的「網格員」，負責維持所轄網格的安全——當然也包括了監控的任務。出人意料的，《全面監視》真的訪問到一位「網格員」，這位「網格員」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成為監控體制的一部分（或者有意識到但不覺得有什麼不對？）而認為自己在做福國利民的社會服務。另外，網格體制招募在地居民而組成類似社區服務隊的組織，也是令人訝異。這些社區服務組織的成員白天在公益食堂為老人準備餐點，晚上到處巡

邏，檢查路上有沒有垃圾或車子有沒有停好——如果你的車窗忘了關上，還會打電話通知你。即便撇除高壓的政治監控不談，在社區中有一群人無微不至的「關心」你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想來也是毛骨悚然。

另外一個重要的監控機制為當前國際熱議的社會信用體系。這個體系利用無所不在的監控為中國人民打分數：檢舉胡亂停放共享單車可以得多少分，而不遵守交通規則會扣多少分——影片還特別為我們畫重點：從事異議活動扣分最多。每個人得分多少，直接影響到生活的日常：能否升遷、能否買房、甚至小孩的發展等。在《全面監視》的詮釋裡，社會信用制度幾乎是個動用龐大資源、從政府到人民無比認真一起玩的大型遊戲，其結果是將中國帶進一個十足後現代的戲謔氛圍。

當然，這部片另一個重要目的，是在記錄三位維權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，分別是律師常瑋平和他的妻子陳紫娟、兒子常小弟，律師王全璋和他的妻子李文足、兒子王小弟，以及中國「#me too」運動的代表性人物黃雪琴。這當中最令人鼻酸的，毋寧是年紀相仿，約莫 10 歲左右的常小弟與王小弟。

在父親被補後，常小弟與母親相依為命，而令人意外的（或許也是迫於無奈），常小弟直接涉入母親救援父親的種種計畫，如謄寫申訴信、拍攝聲援影片、乃至兩次與母親千里跋涉希望探望父親以及參加父親的宣判（可惜都未能如願，政府利用監控技術提前掌握並阻止他們的行動）。從影片來看，常小弟似乎是個相當聰明、有才華的孩子。他隨著母親參加救援父親的行動，也與王全璋一家交往。我們看得出他完全知道這個政府對父親幹了什麼事，也完全知道自己的處境，對父親的思念表露無遺。在整部影片出現的人物中，他似乎是最壓抑自己的一個人，但在無法壓抑時，也是情緒最暴烈的一個人。很難表達對常小弟遭遇的感受，只能說百般心疼。

導演給王小弟的鏡頭不多，但從他的遭遇，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政治犯的小孩必須付出的代價（當然常小弟也是）。影片中有一段記錄，他的父親原本就要帶他上學了，出門時卻因當時正逢歐洲使館舉辦人權相關會議，當局不允許王全璋一家人出門，王小弟因而跟著被關在家中，無法上學。他的父母直言不諱的向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，也明白告訴他當局對他們做的是錯的事情。這

大概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人權教育了，但背後付出的代價難以想像。

回到影片本身。我很喜歡這部片對鏡頭的運用，導演巧妙的採用鏡頭的語言——可能是鏡頭的構圖，抑或鏡頭的移動、拉遠拉近等——讓影片不再只是日常生活的側錄，而是為錄到的影像建構意義，傳達導演對現實的批判。於是我們看到，中國政府用鏡頭遂行監控，而張嘉玲導演用鏡頭發起反抗。究竟導演的一顆鏡頭能不能對抗政府數億的鏡頭，就看我們在觀影之後是否願意接棒，與導演一起建構反抗的力量。

